

书法在法，而其妙在人

——李忠庆其人其书

人物



李忠庆，1945年生，舟山定海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宁波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宁波书画院秘书长、宁波市文联组联部主任。

方向前

人们常用“字如其人”来描述写字与为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字会流露出书者的性格和情感。诚如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所说：“余谓笔、墨之间，本足觐人气象。”

苏东坡对此也颇有洞见：“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苏轼不但将字体拟人化，还将书法人格化了：“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按东坡先生的意思，看一个人的字就可知其为人，甚至还可从字里看出是君子还是小人。这一说法或许有点偏激，但苏轼此言也道出了历来人们对书家人品之重视。当前，艺术领域大力提倡德艺双馨，就是对艺术家“人品”的看重。

书法关乎“人品”，更关乎性格。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的《艺概》对此有过精辟论述：“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刘氏直接指出了不同类型人的书法气质与特点。

言归正传。我与李忠庆先生的第一次交往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刚从余姚调至宁波工作，因为入书协之事，去市文联组联部咨询相关情况。李先生热情、认真、严谨的工作风格，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现在看来，李先生的这份认真与严谨，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的书法创作中。

书风端雅庄重，结字谨严平整，线质厚实，法度讲究，传统功

夫深厚，这是我对李忠庆先生书法的总体印象。

我所见李忠庆先生日常写得最多的是楷书，尤其是小楷。楷书反映一个书家的内功，写楷书忌“板滞”，忌“紧结”。苏东坡指出，真书（楷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作为一种书体，楷书不一定非要写得四平八稳，它有时也可以像行书、草书那样，抒情达性，书写自由，充分表达书家的感情和思想。李忠庆先生的楷书，如其行事风格，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平整严谨，毫不懈怠。但若细细品味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书家在行笔时稳重淡定，书写时放松自由，偶以“楷中有行”的牵丝映带，写得游刃有余。

近日，江北政协书画院正在举行“翰墨颂辉煌——李忠庆小楷作品展”，展出的几十件泥金扇面及小斗方小楷作品，展示了书家对小楷艺术的探索。扇面是一种很难把控的书法创作形式，对当代书家而言，尤其是一种挑战。扇面虽小，其艺术容量及价值却不容小觑，它要求书家在章法布置、书写技巧及书写内容等方面用心经营。就拿扇面画来说，高质量的扇面书画往技法细腻，画面内容丰富，用纸、用色都十分讲究，倘若采用“大写意”，欣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小”扇面里蕴含着“大”功夫。

小楷《浪淘沙·北戴河》是这次展览的其中一件泥金扇面作品，全篇共70字，总体布白较疏朗。此作有两大精彩处：

一是笔法、字法精到。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作字唯有用笔与结字。用笔在使尽笔势，然须收敛纵有度；结字在得其真态，然须映带匀美。”此扇面笔笔精到，线条到位，线质厚重而灵动，每个字的上下笔画之间，上下字之间，乃至左右行之间，均显得连贯、通畅而又彼此照应。虽是规整楷书，然能做到形断意连，点画富有变化。如“大雨落幽燕”之“燕”字，“廿”字头的竖笔起笔，均以露锋入笔，但落笔方向、轻重各异，产生的竖笔起笔形态各有不同，收笔处，左竖重，收笔回锋，右竖轻，收笔露锋，形体上做到上开下合。“燕”的中间部分，在笔法和结构上力求多变，如“口”两边的“北”字，左收右放，左低右高，左小右大，在造型上也不同。尤其在“燕”下面的“……”处理上，各个点的形态、方向、大小不相同，彼此间达到了笔意连贯、牵丝映带，可见书家熟谙书法“求变”之道。

书者的“静”与作品的“静”，是《浪淘沙·北戴河》的又一



特点。“静致”是一个成熟书家的内功，是书画作品的一种高境界，也是古今书家普遍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朱熹曾对“静”作如此释读：“静，谓心不妄动。”写字前书家静心养神，研墨读帖，只有保持“静”的心境，才有可能写出作品“静”的境界。在这件作品中，书家行笔时不激不厉，笔墨间圆润无躁气。

如何欣赏一幅作品，叶圣陶先生对弘一书法的评介，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叶氏也是一位书法家，他却自谦道：“我不懂书法，然极喜欢弘一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个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除小楷外，李忠庆先生也常作行草，偶书大楷，且为不少名胜古迹题过字，其中以“超然阁”三字最为精彩。此作取法唐楷，既有唐楷的严谨，写出了大唐之大气象，

厚重中不乏生动，端庄中不乏活泼，此作又融合了“二王”书法的意味，帖派书法的秀美，笔法讲究，结字自然舒展。“唐楷”与“二王”融合自然得体，堪称一件难得的佳作。

李忠庆先生的行书以“二王”为宗，秀美俊朗，风格上与小楷大体一致，在章法与字法上，行书更具变化，收放、开合、疏密、长短、粗细互为对比，书写节奏抒情感强，行笔自由畅快。

明代宁波书法家丰坊在《书诀》中讲到：“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动逸。伯喈（东汉书法家蔡邕）以下皆然。米元章称谢安石之《中郎帖》、颜鲁公《争坐》书有篆籀气象，乃其证也。”书法艺术需要师法古人，需要兼善并收，而默默耕耘则是求精路上的不二法则。作为老一辈书法家，李忠庆先生一直很低调，低调得甚至有些寂寞。他把自己比作书法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其书斋取名曰“浪花楼”。

电影《突围》的人性美



徐渭明

《突围》是首部正面表现新四军浙东纵队战斗历程的主旋律影片。在动辄以巨额投入、豪华阵容制作战争片的当下，该片以大主题、小投入、实力阵容的路径完成了既定的创作意图，足可谓成功。在建党百年、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80周年的年份，该片在全国影院上线，颇有意义。

《突围》又是一部把战争作为叙事框架，解析人性之美的非典型战争片。在新四军浙东纵队一部奉命北撤陷入重围、继而化解危机突破包围的故事情节里，影片通过人物塑造、矛盾建构、背景铺垫、细节设计，较好地完成了战争背景下爱与恨、死与生的人性演绎，艺术地回答了浙东纵队一部之所以能突出重围的必然性，塑造了新四军指战员群像，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

——爱与恨的逻辑。影片开局一场喜庆的婚礼，巧妙地渲染了抗战胜利后的和平氛围。新四军军官张大龙与女干部葛秋英半途中止的婚礼，既把北撤的紧迫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展现了新四军指战员收起儿女私情、服从民族利益的大爱。

影片的主体虽然是“突围”，但大部分镜头并不在血肉横飞的战场。影片花了不少时间，着力讲述浙东纵队北撤前和到达澈浦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故事。比如，北撤前，浙东纵队及时以粮食实物为“硬通货”，紧急回收“抗币”，让根据地群众免受损失。比如，为封锁浙东纵队北渡杭州湾的通道，先前投降日军而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的田岫山部强行炸毁民船、殴打船工，激起了杭州湾南岸渔民群众的愤怒。结果，船工老伯冒死为新四军送来了海涂上藏船的“宝图”，使新四军北撤需要的数以百计的船只有了保证。

无独有偶，当浙东纵队一部进驻澈浦、与十倍于己的强敌对峙时，澈浦乡绅俞飞鹏一开始拒何克希于千里之外，后来被新四军上门送医等举动感动，主动送饭、赠送暗藏的机枪、送小儿子参加新四军，诠释了得道多助的真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热爱。

——死与生的礼赞。战场是生死场，战场也是艺术作品可以最直表现人性之美的载体，尽管这样的美有时很残酷，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该片中有个兵痞名叫周发奎。此人抗战胜利前随张献民起义加入浙东纵队，成为二旅的一名基层军官。尚未改造好的他，先是扰民被关禁闭，又在北撤途中带人脱队准备“回家种田”，不料被国民党军拦截，被迫加入国军行列。在受尽国民党军侮辱之后，醒悟的他率众重返浙东纵队战壕。电影对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呈现给了镜头，他凛然质问

一众国民党官兵，脱掉了国民党军军服，慷慨赴死。

张大龙的牺牲场面，是电影的高潮之一。这位英勇智慧的浙东纵队中层指挥员临危受命，率队佯攻引敌、继而阻敌主力，为何克希司令员率主力突围创造条件。影片把最集中的战争画面锁定在他们坚守西北隘口的战斗中，同时运用了两种艺术手段，讴歌他们的牺牲精神：

一是歌声烘托。在西北隘口最后一搏前的空隙里，张大龙带头唱响了《新四军军歌》，没有管乐伴奏、近乎粗糙的男声合唱，营造着真实感，传递着为正义而战、视死如归的豪迈。

二是小道具的妙用。爱酒的张大龙婚礼上收到了战友的礼物：一把小酒壶。在草蛇灰线的情节设计里，张大龙总是想用却用不上它，等到秋英把灌满酒的酒壶还给他时，他就要上战场了。影片结尾时，这酒壶作为张大龙遗物交到了秋英手上。秋英百感交集、泪流满面，爱与死这两个艺术的永恒主题，在这小酒壶上交汇。而当秋英把小酒壶紧紧贴在胸口、抬起头来时，影片也完成了对于死亡和永生的艺术思辨，完成了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礼赞。



鉴赏与收藏

应敏明

家具中，最庞大、最奢华的要数拔步床。

拔步床，又叫八步床、出帐床，出现于明末，是当年江南人家的结婚用床。拔步床体积硕大，占据卧室的一半，它像一座建筑，前有回廊，后有正厅，回廊里还可置放小家具。拔步床适用于南方，北方严寒的冬天要用暖炕。

农耕社会财富增长缓慢，造物讲究经久耐用，代代相传，而拔步床往往是普通人家除房屋之外最值钱的财产。对于拔步床的金贵，小说《金瓶梅》中多有描写：再嫁的孟玉楼，让西门庆动心，离不开媒婆介绍的家底：“手里有一份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后来，西门庆发嫁西门大姐，促忙促急攒造不出床来，就把孟玉楼嫁来的一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给了大姐。这床时价银子百两。

江南四季分明。夏季，拔步床拆去围屏，通风凉爽；冬季，拔步床则可插上围屏保暖。江南拔步床以苏作和甬作为代表。苏作拔步床呈廊柱式，线条流畅，结构空灵，用材精良，尤以黄花梨拔步床最为名贵。2018年国内一场拍卖会上，一张苏作黄花梨拔步床以2800万元人民币落槌，专家说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

甬作拔步床，以清中晚期最为典型，这拔步床当地又叫千工床。千工意指工时之长、工艺之精，奢华到“吹毛求疵”的地步。甬作拔步床大致分为三种：朱金拔步床、嵌镶拔步床、清雕拔步床。

形似独立小屋的拔步床



甬作拔步床的形制大同小异，通常前面是回廊，回廊左边放厢式马桶，右边放把椅子，再进去就是一个睡觉的架子床。回廊前顶上有层层镂空雕刻或粉画，床眉上有雕刻花板，四柱上方分别挂着小插人，中间有一根藤花窗，下方有雕刻大花板。拔步床一般高2.8米，宽2.2米，深2.3米；主要差异在于装饰手法和材质。

朱金拔步床，是著名“十里红妆”中最重要的家具，通体朱砂红，雕刻处飞金，可以用惊艳两字来形容。清代时，有位法国传教士来到江南农村，看见许多金碧辉煌的朱金拔步床，回到法国后他在回忆录中

写道：中国江南太富有了，他们睡的床都是用黄金和宝石打造的。

朱金拔步床农村比城市更多，但材质多为就地取材的普通柴木，在床脚、床榻、床顶、床侧等看不到的地方，做工较粗糙。朱金拔步床主要观赏它的正面，这可能跟农村建筑“明堂暗室”的设计特点有关，因为睡房幽暗，人们一般不太会去注意眠床侧面、后背的细节。我遇到过两张精美的拔步床，一张在宁海箬香村，床罩有13道镂空雕，床眉是两排雕朱金花板，四柱堆塑雕鱼纹和灯笼，非常漂亮。另一张在余姚四明山一小山村，一般朱金拔步床有双排雕已经很好了，

但它有四排雕，朱金花板密密麻麻有32块，题材是戏曲人物和花鸟动物，雕刻极为生动。好多年前，我上门前去求购，前一张出价20万元，后一张出价48万元，两家主人都坚决不卖。据我所知，收藏朱金拔步床最多的要数著名收藏家何晓道先生，几十年来他专注收藏、弘扬“红妆”文化，功勋卓著。

嵌镶拔步床的做工比较全面，用材多为红木、花梨、榿木、楠木等优质木材，嵌镶底板不是红木就是花梨，很少用柴木。柴木软，热胀冷缩幅度大，不宜嵌镶。宁波嵌镶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有高嵌、平嵌、混嵌，嵌镶材料有象

牙、黄杨、牛骨等。宁波嵌镶拔步床“花里胡哨”，市井气息浓，城区中很普及。我市收藏家吴圣东先生创办的宁波千工甬式家具博物馆，收藏有一张非常有特色的白骨嵌镶拔步床：白骨嵌镶山水人物，黄杨吉子雕工精湛，尤其是两块呈持扇娴姿的女子消暑图案，闲适、有趣，两只床头狮憨态可掬，可爱至极。

最具甬作家具气质的，是清雕拔步床。清雕拔步床通常采用五种好木材制作，意为五树其昌（五世其昌），赋予传承接代的美好寓意。五种木材会从以下木材中挑选：紫檀、红木、花梨、榿木、楠

木、黄杨、榿木、樟木、杏木等。

清雕拔步床的清雕，即在雕刻好的雕板上髹以薄漆，保持拔步床原汁原味的雕工之美，常见的有红木清雕、榿木清雕等。清雕拔步床还采用全榿卯一根藤条子和众多吉子装饰，有点睛之美。制作清雕拔步床重视打磨，必须打磨到位，使材质表面极为光洁，再施以薄漆，保留材质的天然肌理，收藏界称之为“清水皮壳”。

著名收藏家周巨乐先生收藏有一张清雕拔步床，用红木、榿木、黄杨、楠木和杏木搭配，形制端庄素雅，红木清雕，上雕花卉，下雕荷塘月色、凤穿牡丹，榿木四柱上挂着“才子佳人”小插人，前面两侧红木一根藤花窗，床上有60个黄杨吉子点缀，整床“清水皮壳”，木工、雕工脱俗趋雅，是清代甬作家具的经典之作。

以上三种甬作拔步床形制各异，但雕刻题材大同小异，不外乎戏曲人物、文人典故、神话传说、花鸟虫草等。有的拔步床内外雕刻，尤其是内屏雕刻和粉画，有时会出现含蓄的春宫图。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床上度过，没有一种家具像床一样跟人保持那么长久、密切的关系，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拔步床因为体积庞大、造型封闭，当代人早已不置不用。不过，也有酷爱传统甬作家具的人士对拔步床情有独钟，如宁海一位企业家，今年投资近千万元，请来著名雕刻匠宁海前童人童帝新，带领几位能工巧匠，采用红木材料、传统手艺，制作了三张传统甬作清雕拔步床，整床满雕，气势恢宏，富丽堂皇。每张床用时千余工，是名副其实的“千工床”。